

中外名记者丛书

李普曼

林 珊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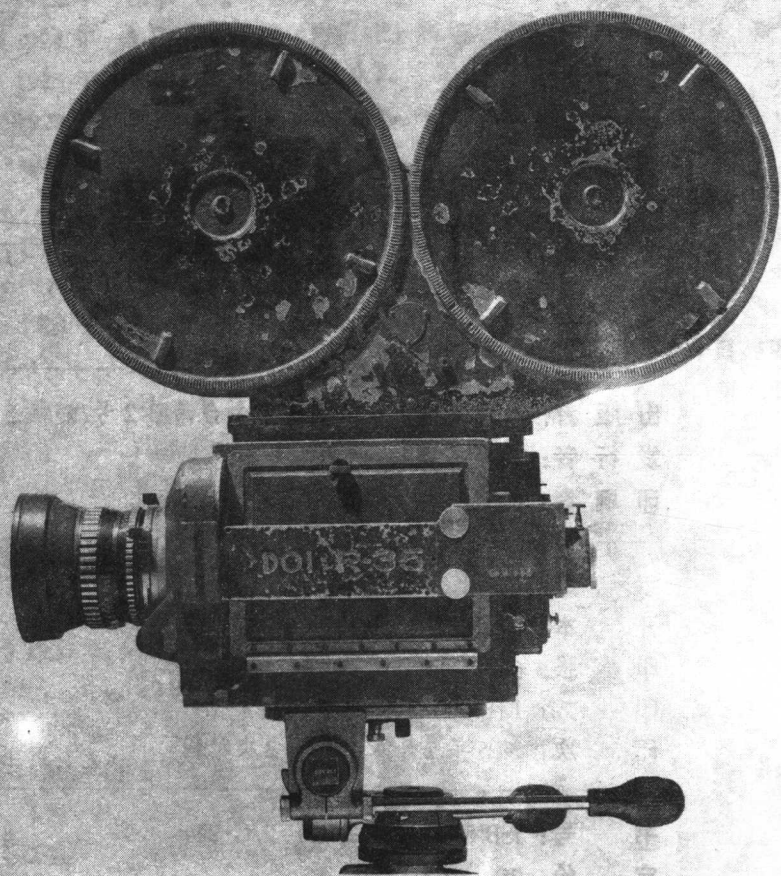
Series Books of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外名记者丛书

[美] 李普曼

林 珊 著



Series Books of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普曼/林珊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5.10

(中外名记者丛书)

ISBN 7-80002-787-2

I. 李… II. 林… III. 新闻工作者 - 李普曼 - 美国 - 评传

IV. K837. 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5)第 14633 号

书 名: 中外名记者丛书—— [美] 李普曼

著 者: 林 珊

责任编辑: 颜景政

出 版 者: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邮编: 100733)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铁建印刷厂

字 数: 108 千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6

印 数: 1 - 1000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80002 - 787 - 2/G · 224

定 价: 25. 80 元

编者的话

中国、外国都有一些著名的新闻记者。由于他们发表过大量成功的新闻作品，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探讨中外名记者成长的道路，借鉴他们在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培养我国新一代的名记者，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服务。

这套丛书的编辑体例是：每位名记者各占一本，每本15万字左右。前面是专家对他们的评传，后面是对其作品的精选。

目 录

人物评传	(1)
李普曼的生平	(1)
“今日与明日”专栏	(25)
李普曼的新闻思想	(33)
总结	(45)
作品选编	(49)
德国的选举与希特勒的发迹	(49)
纳粹焚书	(51)
苏联的挑战	(53)
一个总结	(58)
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	(62)
买主们	(91)
坚定的读者	(98)
新闻的性质	(104)
新闻、真实和一个结论	(115)
生平年表	(120)

人物评传

李普曼的生平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 9. 23—1974. 12. 14）是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政论家。他用毕生的聪明才智为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出谋献策，受到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朝野的推崇，他们把一顶顶桂冠——“首屈一指的无冕之王”、“白宫的谋士”、“华尔街的智囊”、“专栏作家的首脑”等等加在他的头上，使他成了西方新闻界的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

李普曼纵横论坛半个多世纪，著述很多，美国耶鲁大学特设置了李普曼专门阅览室，收藏有李普曼为《先驱论坛报》写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文章 89 卷，其他文章 288 篇，《世界报》社论 10 卷集，李普曼著述目录 26 卷，李普曼著作的外国译本 36 种，关于李普曼著作的书评 122 篇，李普曼的照片、画像和漫画 120 幅，还有许多李普曼的手稿、私人信件，以及外国赠送给李普曼的学位和荣誉状等等。

李普曼的著述如此之多，影响又如此之广，这就有必要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经历与他的思想和观点。

沃尔特·李普曼于 1889 年 9 月 23 日出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德国犹太移民第二代的家庭。父亲是个富有的服装制造商和地产商，自幼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他又是家庭的独子，备受父母的宠爱。父母亲立志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从童年时代起，每年夏季他都定期地跟随他的父母亲到欧洲去旅游和避暑。这使幼年的李普曼自然而然地熟悉了欧洲的建筑、雕塑、绘画、语言、地理和历史。

从 7 岁开始，李普曼进入纽约西 59 街 32 号的朱利叶斯·萨克斯博士办的一所私立男校读书。这是一所专为德意志犹太人集团

的子弟开办的学校，教师也多属犹太人。由于他聪明好学，成绩特别优异。特别是外语，他能把法文不规则动词记得很熟，希腊文也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他还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背诵许多国家及其首都的名字，中学时代，他就开始给校刊写稿。在萨克斯男校，李普曼饱览了很多文学名著。给他打下了很好的学习基础。

李普曼自幼生长在一个阔气的犹太人的圈子里，尽管他生活在一个爱好艺术的家庭里，但他和他的家人所认识的人，几乎都是有着德国背景的犹太阔佬，他不愿意与犹太族化为一体，在兴趣和抱负上，他都竭力想冲破种族的约束。

1906年，李普曼已经17岁了。他中学毕业，因学业成绩超人而免试升入了美国著名的最高学府哈佛大学学习，他的父亲原希望他能在哈佛学习法律，他的辩论课老师阿瑟·菲尔德·海斯亦鼓励他在哈佛毕业后进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学习，将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但是，法律对于李普曼没有吸引力。他的母亲则建议他学习艺术，李普曼自己想成为艺术史学家，后来他自己选择的却是“社会批评”。^①

哈佛大学的生活使李普曼既增长了学识，又锻炼了才干。他只用三年的时间，修毕了七门哲学课，五门语言课（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等），三门英语课和比较文学课，三门经济学课，一门历史课和一门政治课；而且，大部分课程的成绩都得了A，个别是B，从而荣获了美国大学里为优秀学生设立的荣誉组织斐·贝塔·凯魄学术荣誉协会的奖励。这些课程的学分正常是需要四年的时间才能修毕的。换句话说，他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修毕了四年的课程而取得了学士学位。由于萨克斯男校为他奠定了很好的学业基础，所以李普曼在哈佛大学的学习并不十分紧张。使他有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到图书馆里去学习、自由写作和参加在校园里举行的各种讨论会和辩论会。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易卜生、肖伯纳和威尔斯等人的名著。对于哲学，他本来知晓甚少，有一次，他听了哈佛大学著名的柏拉图主义哲学教授桑塔耶那的演说，萌发了他对哲学的兴趣，他在哈佛大学修满学分以后的一

^① 美国拉里·亚当斯：《沃尔特·李普曼》1977年波士顿出版，第17页。

年，就是在桑塔耶那门下当助教，专攻哲学而度过的。

19岁的李普曼常常给哈佛的校刊《倡导》和《哈佛月刊》等写文章，他在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批评了哈佛教授巴雷特·温德尔所写的《特权阶级》一书，温特尔崇尚英国上流社会，书中的权贵思想触犯了李普曼的自由主义观点。李普曼写文章反驳说，一个普通劳动者“不停地建造他永远不能踏进门坎的房子，除非需要维修时；不停地生产粮食，但自己的孩子却饿着肚子去上学；不停地制造汽车，供给那些时髦的阔太太可以带着她们的玩物去兜风。”^①李普曼的文章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反应很强烈，几乎所有主持社会正义的人都为之振奋，其中就有哈佛大学教授、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

1908年秋季的一个早上，威廉·詹姆斯亲自敲开了李普曼的房门，他首先和蔼可亲地向李普曼报了姓名，然后热情地赞扬了李普曼所写的关于温得尔的文章。这对李普曼来说，真是受宠若惊。从此以后，这位老教授几乎每周四上午都邀请李普曼到他家里喝茶和聊天，他们海阔天空，从政治、伦理到宗教等等无所不谈。詹姆斯鼓励李普曼认真读书，多写有关政治和哲学的文章。这些教诲使年轻的李普曼永远不能忘怀，在他日后的著述中都留有印记。詹姆斯还教育李普曼，作为一名作家，每天都要写至少一千字的文章，不管是否愿意，也不管有无东西可写。李普曼曾告诉他的父母亲，詹姆斯与他的谈话是他在哈佛大学的生活中最了不起的事情。

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李普曼还受到信奉费边主义的经济学教授雷厄姆·沃尔斯的赏识，李普曼经常到他门下求教。

此外，李普曼还广泛地阅读了历史、哲学、心理学和文学等方面的书籍。其中，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和费边社会主义思潮等等，对他的影响都比较深，这些影响在蚀后来的著述和社会活动中都可以见到明显的反映，美国拉里·亚当斯写的李普曼传记中说：“李普曼是柏拉图、弗洛伊德和詹姆斯的崇拜者。”

^① 见罗德·斯蒂尔著《沃尔特·李普曼与美国世纪》第16页。

进入哈佛大学第二年的复活节前一个星期，一场大火席卷了学校附近切尔西城的贫民窟，数以千计的人无家可归。这情景大大地激发了李普曼的同情心。他志愿参加了波士顿公民福利机构——黑尔社和市民服务社去作救助灾民的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贫苦的人民，他亲眼目睹了贫困是人类社会的现实，他开始怀疑产生这种贫富不平等的制度，产生了社会改革的思想。以后，他参加过费边社，口袋里装着费边社的社员证，每月交纳一英镑的社员费，有一次还在英国参加了费边社的集会。费边主义之所以对李普曼具有这样的感召力，是因为它完美无缺地表达了中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意愿。因为费边主义者提倡温和渐进的方式，而不是运用暴力来使穷人达到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李普曼曾读过《共产党宣言》和卡尔·马克思的其他一些文章，他讨厌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斗争，他认为“煽动”群众去搞暴力行动不是实现一个完美的世界的可取方式。这些都是典型的费边主义思想。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李普曼钻到图书馆里，贪婪地阅读了许多费边主义的著作。然后他宣布他已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信仰，并且决定在哈佛校园里建立一个讨论社会主义的小组。1908年5月，李普曼和另外八个学生组成了“哈佛社会主义俱乐部”。大家一致推选机智善辩的李普曼担任这个俱乐部的主席。这个俱乐部建立了自己的资料室，每隔一周，召开一次讨论会，这些年轻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常常对一些问题或一些理论争辩得难解难分。俱乐部还常常邀请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来讲演，例如专门从事揭露黑暗的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柏拉图哲学教授桑塔耶纳等等。威廉·詹姆士教授也曾来俱乐部表示祝贺。

李普曼和他的同学们并没有把俱乐部的活动局限于哈佛的校园里。由于李普曼能说善辩，他还到其他大学作鼓动演说。校际社会主义协会邀请他参加会议，1910年春，这个协会在纽约召开第一次大会时，李普曼曾在会上发表了引人注目的演讲，同年年底他参加了该协会的执行委员会。

李普曼在哈佛校刊上发表文章以及在社会主义俱乐部显露的辩才，使他在哈佛校园里已小有名声。一次，他被邀去“西部人俱乐部”发表演说，这个俱乐部是他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美国著

名记者，采访过俄国革命并写出《震撼世界的十天》的约翰·里德组织的，当里德把李普曼介绍给听众时，他赞扬说：“先生们，这位是美国未来的总统！”会场上顿时响起笑声。

20世纪初叶的美国，劳动人民受垄断资本的剥削和压迫日趋严酷，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反抗运动时有发生。与此同时，大生产排挤和吞噬小生产的过程正加速进行，中、小资产阶级被迫掀起了反抗现实的改革运动。当时曾涌现了一大批进步作家，如雅各布·瑞斯、斯巴格·劳埃德、林肯·斯蒂芬斯、辛克莱、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等，他们写了许多政论和小说，揭露和控诉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美国人民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社会改革运动。在这样的形势下，向往改革的青年李普曼，对自己的前途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认为艺术史的学识太浅薄，学法律更是不可思议，他对学习生活已经厌倦了，便毅然舍弃了唾手可得的硕士学位，离开了哈佛大学，投身社会改革的实践。

李普曼通过哈佛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活动，结识了波士顿社会上的许多改良主义者，其中有曾担任过公理会牧师的拉尔夫·艾伯森。1910年，艾伯森筹划到一些经费，办起了一份报纸——《波士顿平民报》，艾伯森担任该报的发行人，查尔斯·朱布林任编辑，他们虽都不懂新闻，但都热心于社会改革。该报需要一名记者，便向李普曼发出了邀请。李普曼拿不定主意，征得了林肯·斯蒂芬斯的同意，并重温了他在校刊工作的经验，自认为写作是他的拿手好戏，便接受了艾伯森的邀请，于1910年5月到这份改良主义的月刊《波士顿平民报》当上了“初出茅庐的记者”。然而事实并不像他想像的那般美妙，李普曼在报社只是蹲在办公室里阅读剪报和重新阐述事实，工作十分单调乏味，这使李普曼大失所望，他只干了六个星期便离去了。

接着他到林肯·斯蒂芬斯主编的自由主义刊物《人人杂志》担任编辑并兼作斯蒂芬斯的秘书。李普曼在《人人杂志》干得很出色，他与斯蒂芬斯配合得很默契，他帮助斯蒂芬斯搞调查，合作写连载文章。

1911年春季，斯蒂芬斯离开《人人杂志》到英国去了。“揭

露黑暗”、“揭露丑闻”作为一种社会改革运动已逐渐不时兴了，李普曼也就转向自由撰稿，他曾为社会主义观点的月刊《国际》写政治专栏，还为纽约的《号角》周刊和《群众》写稿，并参加了“自由主义俱乐部”。

1912年1月1日，美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里维尔德·乔治·伦恩以建立“良好政府”的口号，当选为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市长。伦恩对政治缺乏经验，对社会主义也动摇不定，他要物色一个聪明能干的青年作他的助手。朋友给他介绍了李普曼。李普曼对社会主义理论虽有研究，但对政治可说还是一窍不通，便想借这个机会去实践一下，当1912年元旦伦恩走马上任时，李普曼也已就位了。伦恩分配给他的工作是草拟发言稿、为市政府起草预算、会见选区的头头和工会领导人以及向记者提供情况。就这样干了4个月之后，自认为是“富有战斗精神的社会主义者”的李普曼，指责伦恩市长的政策过分软弱，他对政治实践也渐渐失去兴趣，便决定保持“独立”的立场，选择了作家的道路，躲到缅因州先后写了《政治导论》和《放任与驾驭》两本书，前者在1913年春出版，后者出版于1914年。

当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还没有为很多人接受时，李普曼就意识到这种颂扬本能，反对理性，引导人们离开现实生活和阶级斗争对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是十分有价值的。他的第一本著作《政治导论》中就运用这种理论探讨了人性问题，并且把它作为社会分析的方法，从而得出结论认为人类基本上是不能以理性来控制其本能的冲动和欲望的，人类社会也是很难达到完美的，“文明”阶段的。他最终呼吁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政府，而且在他的笔下，西奥多·罗斯福正是这样的英雄。者罗斯福也因此而赞扬李普曼是那个时代“最聪明的年轻人”。

本世纪初时，正当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候，李普曼错误地认为随着托拉斯大企业的发展，企业老板已成为分散的股票持有者，这种大企业的性质有了改变，已不再是追求私人利润，而是为了许多人的利益。因此，1913年他的思想也有大幅度的改变，他已不再感兴趣于他昔日追求的“社会主义”了，他不参加“学院间的社会主义协会”的集会，也不再为激进的刊物写

稿了。就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看到了正在迅速发展的俄国革命，他预感到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认识到消除社会主义的思想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所以，他在1914年出版的第二本著作《放任与驾驭》中曾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宜于目前的时代。”美国赫伯特·阿普特克曾说，李普曼还曾自告奋勇地承担起“在摇篮里扼杀社会主义革命的婴儿的任务”^①

李普曼曾说过，没有文学，人民是愚蠢的，没有小说、诗歌、戏剧和批评，就既没有想像，也没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没有文化，你能打倒政府，使贫富颠倒过来，但是你不能够创造一个人们生活中的真正的革命。李普曼就是本着这种信念，孜孜学习，涉猎很广的。^②

李普曼的两本书出版时，李普曼年仅25岁。尽管它们的篇幅不大，但结构严谨，具有洞察力。随后，他就到英国考察去了。他在伦敦会见了在英国出版他的著作《政治导言》的费希尔·昂温，当昂温告诉他还要出版他的新著《放任与驾驭》时，李普曼颇为高兴。他还结识了很多人，其中有《泰晤时报》编辑杰弗里·道森、知名记者威克姆·斯蒂德，以及“费边社”的创始人比阿特丽斯·韦布和西德尼·韦布。后来就与友人乘火车到英格兰西北的湖区去参加费边主义者一年一度的夏季聚会。会后他与肖伯纳进行了交谈。可是，正当他漫游比利时等国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不得不中断他在欧洲的考察，返回纽约。

当李普曼回到纽约时，《新共和》杂志的出版筹备工作已接近尾声。他参加了确定第一期稿件的讨论，并帮助解决一些出版和发行中的琐碎事务。《新共和》的创刊号在1914年11月7日正式出版，它的口号是“采取温和的立场和承担社会义务。”传记作家斯蒂尔说，它成了那些最严肃和最富于创见的思想家用英文发表自己观点的论坛。约翰·杜威、乔治·桑塔耶纳、H、G、韦尔

① 赫伯特·阿普特：《沃尔特·李普曼和民主》原载美国《政事月刊》1956年，第2期。

② 拉里·亚当斯：《沃尔特·李普曼》第16页。

斯、肖伯纳等著名的专家教授都为这个杂志撰稿。《新共和》还行銷欧洲，1918年底战争结束时，它的销售量已达到每周四万余份。

《新共和》问世时，正值李普曼的第二本著作《放任与驾驭》出版，李普曼为之激动万分。传记作家施蒂尔说，《放任与驾驭》的出版标志了李普曼与黑暗揭发者和社会党人的决裂。因为李普曼这时错误地发现，“拥有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股东的大公司并不归任何私人所有，那些表面上拥有公司的股东们实际上并不能支配公司，行使支配权的是具有高度技能的经理们。因而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能把社会的弊病都归罪于工业资本的集中。李普曼所指出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分离，比美国专攻公司法的著名律师珂道尔夫·奥古斯塔斯·伯利和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普·安斯特沃恩·米恩斯对这问题的详尽研究早了20年。1914年冬，李普曼在日记中自称他有了重大变化，也许是变得保守了。他停止去参加校际社会主义协会的会议，并且不再给激进的刊物写文章了。

一般说，李普曼与赫伯特·克罗里、沃尔特·韦尔和查尔斯·梅尔茨等人创办的《新共和》杂志是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刊物。它结识当时美国的权势人物，并评说美国政府的政策。它时而倾向于罗斯福，时而支持威尔逊政府，从1915年秋季开始，李普曼定期前往首都华盛顿，为《新共和》的专栏“华盛顿笔记”收集素材。他结识了许多重要人物，如威尔逊的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等，他同威尔逊总统的关系也已达到“非常融洽”的程度。后来，《新共和》为帮助威尔逊竞选总统出了不小的力气，因而这个杂志曾被认为是威尔逊总统的喉舌。

1917年4月，李普曼到宾夕法尼亚州出席了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会议，并且在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演。对于年轻的李普曼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李普曼能得到这个研究院的邀请，也表明了他是为威尔逊和豪斯上校在幕后行使权力的谋臣策士。

美国参加一次大战后，战争要求美国首先要有一支强壮的军队，为了招兵买马，威尔逊提出了选募法，要求十八岁到四十五

岁的男子都要进行登记。李普曼当时 27 岁，体魄强壮，正符合去当兵打仗的要求，但是，他自认如能为国奉献他的智慧，是更为合适的事。后来由威尔逊总统推荐陆军部长牛顿·贝克让李普曼担任了他的特别助理，这正符合李普曼不愿服兵役的心意。在 6 月初出版的《新共和》上刊出了一条小告示：“李普曼先生由于在陆军部供职，暂时中断了与《新共和》编委会的联系。”

27 岁的李普曼开始考虑自己的婚事了，他与菲伊·艾伯森来往甚密切。菲伊的父亲拉尔夫·艾伯森原是波士顿的一位牧师，也曾是第一个雇佣过李普曼的人。李普曼在哈佛大学学习时，菲伊还只是一个胖乎乎的小姑娘。现在则已是姿容秀美、留着银黄色长发的女郎了。菲伊是舞蹈教师，喜欢参加舞会和社交，对政治可说是毫无兴趣，李普曼对“探戈”舞亦不太了解，两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兴趣。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结合。1917 年 5 月 24 日，李普曼与菲伊在纽约东 80 街李普曼父母家里，举行了婚礼。

婚后不久，李普曼便到华盛顿美国陆军总部大楼里的贝克办公室报到，贝克委任他为“陆军部长机要员”的官职，年薪 1500 美元，这薪金还不及他在《新共和》所挣的一半。

李普曼还担任政府派驻军营协调委员会的三个代表之一，帮助处理劳工关系。

接着，威尔逊指示豪斯上校组织一些专家为最后的和平准备材料。为了保密，把这个机构设在纽约，经费来自总统的特别基金。豪斯首先物色到的就是李普曼。1917 年 9 月底，豪斯上校向李普曼简略地讲述了威尔逊的指示，并讲清楚了这个计划的秘密性质。李普曼带着十分激动的心情交待了他在陆军部的工作，并告别了贝克，到纽约走马上任了。

豪斯请来了一些可信赖的专家，组成了一个“咨询班子”，李普曼是最年轻的，担任这个班子的“秘书长”，他们开始的工作是搜集关于将来和谈时可能出现的问题的资料，还要起草战后世界蓝图的初步设想。李普曼作为这个班子的“秘书长”，他的工作是协调专家之间的工作，把专家们搜集到的资料，整理成书面报告呈送给豪斯和威尔逊总统。这时，李普曼的月薪已达到五百美元。

1917年10月的一天，陆军部长贝克给李普曼看了一份绝密文件，那就是协约国签订的瓜分战利品的“秘密条约”，这些条约表明协约国的成员计划在牺牲同盟国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利益。李普曼对此大为震惊。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李普曼日以继夜地进行工作，草拟了一份“关于战争目的与和平条款”的文件。它勾划出了欧洲国家新的边界，对作出的每项决议都加以解释，每项条款还都附有地图加以说明，经过威尔逊和豪斯讨论和修改以后，就成了旨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便利美国对外扩张和建立国际联盟以对付社会主义苏联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以及解释这“和平纲领”的文件。但是，事与愿违，由于协约国内部分赃不均而相互争执，“十四点和平纲领”未被采纳，李普曼失望地离开巴黎回到纽约，重返《新共和》。

李普曼还接受了《曼彻斯特卫报》的邀请，当了它的记者。

《新共和》这时候已渐渐地变得死气沉沉，它不再享有与白宫的特殊关系，当年那些具有进步思想的读者也都先后离开它了。

李普曼为了取得一点额外收入，曾给《浮华社会》写点专栏文章。他与这个杂志的关系一直保持到1934年。这杂志不但没有减弱他的写作特色，反而发挥了他个性的另一方面，冷嘲热讽和对人物分析的天赋，知识分子的幽默诙谐情调，甚至有些浪漫的理想主义。

1927年，李普曼从这些文章中挑选了一些对人物描写的作品，编成了一本书——《主宰命运的人》，这本书虽不为人们瞩目，但却包括李普曼的远见卓识，并揭示了一些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的情况。

随着《新共和》的老成员先后离去，李普曼也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新共和》。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李普曼认为一些报刊报道的消息都是虚假而不可信的，1917年他先后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了三篇文章，论述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后来他把这三篇文章合在一起出了单行本，取名《自由与新闻》。

李普曼和他的朋友查尔斯·梅尔茨一起，对1917年2月以后的三年时间里《纽约时报》关于俄国革命的报道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调查的结果表明，这张以精确报道而著称于世的报纸，它所发出的消息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受主持新闻机构的一些人的愿望所主宰的。他们发现《纽约时报》报道布尔什维克政权行将垮台的消息竟达91次之多。他们调查所得的结论是：读者们读到的不是事实，只不过是一些人所希望看到的情景罢了。

在他还没有离开《新共和》时，为了要写一本关于舆论的著作，1921年4月他告假半年，躲到长岛北岸的一个名叫韦丁河的村庄去住了将近半年，当年8月，他完成了《舆论学》这本著作。

在韦丁河写书的过程中，纽约最有影响的自由派报纸《世界报》的编辑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突然找上门来向他说，他和普利策都愿意为李普曼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讲坛，使李普曼的思想能够真正地发挥影响，这个讲坛就是《世界报》。具体的要求就是为《世界报》写社论。《世界报》拥有的读者是《新共和》的十倍，而且允许李普曼随心所欲地写，付给他的报酬也比《新共和》多许多。斯沃普的建议是，《世界报》社论版的助理编辑，年薪1.25万美元，每年还有两周休假和两周事假。这些都使李普曼很动心，最诱人的是他能走进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在与《世界报》的出版人拉尔夫·普利策进行长谈以后，李普曼决定接受邀请，并于1922年1月1日开始上班。

《世界报》令人耳目一新的内容一直是赫斯特报系黄色新闻的竞争对手，拉尔夫·普利策接管以后，竭力扭转报道黄色新闻的趋向，这个报纸是美国报界首创社论版对页^①的，它拥有一些优秀的专栏作家。其社论版曾赢得一定的声誉。

金钱和读者对李普曼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引诱力。《新共和》虽然不舍得李普曼的离去，但也无能为力。

《舆论学》于1922年出版，这是一本李普曼较为得意的著作，它虽属李普曼的早年著作，但它包涵了资产阶级许多唯心主义的

① 报纸社论版对面的一页，刊登与社论观点不同的文章，以表示博采众议。

哲理，它的出版曾受到美国政治学界、心理学界、社会学界以及新闻传播学界的推崇和赞扬，在下面的篇章中，我们将作进一步的介绍和评论，这里就不介绍了。

李普曼出生于德国犹太族移民的家庭，在犹太人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由于美国社会对犹太族的歧视和排斥，他总是百般忍耐和自我超脱，不愿意把自己归属犹太社会，他和他的家庭一直认为他们自己是德国人而不是犹太人，或甚至更是美国人而不是德国人和犹太人。尽管这样，他在哈佛大学校园的活动中、在排斥他的纽约的俱乐部，在那些只向“有限的顾客”开放的避暑胜地的旅店等等都使他感到极度敏感。在20世纪初，美国社会又一次掀起排犹浪潮时，有一些私立大学开始限制招收犹太学生，哈佛大学也不例外，校长劳伦斯·洛厄尔主张对校内过多的犹太学生采取一些措施，为此，他任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这个问题。委员会曾征求李普曼的意见，作为犹太族的李普曼非但不严词批评校长的排犹措施，反而随声附和地答复说：“如果犹太学生在哈佛过分集中的话，这不论对犹太移民和哈佛大学都是不妙的”。因而，他建议解决的办法是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一个由犹太人领导的州立大学，说服犹太学生分散就学，以减轻哈佛大学的压力。李普曼还提议，应提高录取分数，并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地理范围内来挑选学生。在这个犹太人排犹的问题上，李普曼表现得真使人难以理解。他虽不隐瞒自己的犹太身份，但他拒绝加入犹太人的组织，拒绝在犹太人的集会上发表演讲，他也不接受犹太艺术和科学学会给予他的奖品。他虽被邀参加纽约的里弗俱乐部和华盛顿的大都会俱乐部，但他被拒绝参加纽约的林克斯俱乐部和尼克博克俱乐部。种族歧视问题使李普曼极为烦恼，然而他总是尽量避免这些种族偏见触及他的生活，自己也总是不表露出受伤害的迹象。

李普曼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以赢得人们对他的赞誉。

《世界报》当时正缺少一个评论关于外交问题的第一流的秀才，李普曼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他为《世界报》写的第一篇社论是关于法国对德国苛刻政策的分析，这篇社论很长，占了整整一版。李普曼工作了一年多后，1923年夏，便升任为社论版的代